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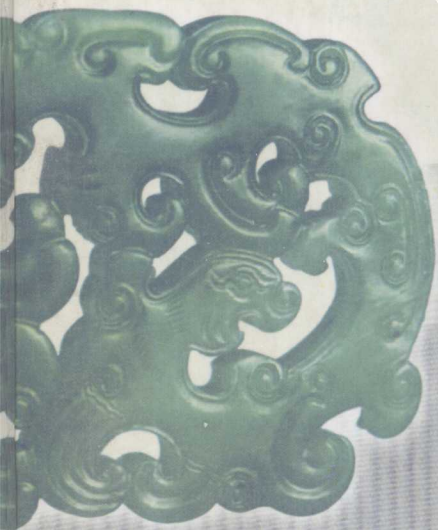
江苏古籍出版社

周勛初文集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5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周勋初文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小 引	3
-----------	---

上编:通 论

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	5
唐代笔记小说的崛起与传播	26
唐代笔记小说的材料来源	72
唐代笔记小说的校讎问题	84
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	
——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	122

下编:作家作品考

韦绚考	132
卢言考	139
卢肇考	149
赵璘考	166
《隋唐嘉话》考	185
《明皇十七事》考	200
《常侍言旨》考	217
《刘幽求传》考	229

《酉阳杂俎》考·····	243
《玉堂闲话》考·····	270
《唐语林》考·····	280
后 记·····	314
附录:读《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程毅中 316

唐代笔记小说叙录

隋唐嘉话·····	327
朝野僉载·····	333
御史台记·····	340
教坊记·····	343
封氏闻见记·····	345
大唐说纂·····	348
辨疑志·····	350
大唐新语·····	352
国史补·····	356
刘宾客嘉话录·····	360
开天传信记·····	363
次柳氏旧闻·····	365
戎幕闲谈·····	368
常侍言旨·····	371
明皇杂录·····	374
大唐传载·····	378
谭宾录·····	381

目 录

羯鼓录	386
芝田录	388
卢氏杂说	391
乾腩子	394
酉阳杂俎	397
因话录	402
资暇集	405
东观奏记	407
贞陵遗事	410
续贞陵遗事	413
云溪友议	415
幽闲鼓吹	418
杜阳杂编	421
桂苑丛谈	423
刊误	426
北里志	428
柳氏叙训	430
松窗杂录	432
玉泉子	435
补国史	439
尚书故实	441
阙史	444
本事诗	447
剧谈录	451

异闻集	455
抒情诗	459
岚斋集	461
唐摭言	463
中朝故事	466
金华子	469
皮氏见闻录	473
闽川名士传	475
北梦琐言	477
纪闻谭	480
鉴诫录	482
开元天宝遗事	485
贾氏谈录	487
唐会要	490
南部新书	494
唐语林	499
本书参考文献	502

唐人笔记小说考索

小 引

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至为发达，曾经提供过不少宝贵的资料。《新唐书》的传记部分出于宋祁之手，宋氏喜欢采录笔记小说入史，《资治通鉴》的情况也差不多，司马光在采录某种资料之后，还经常加以考订，说明去取的原因，后来他又将之编为《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于此可见其寝馈之深。《旧唐书》中也有不少地方引用笔记小说中的材料，例如《唐临传》中“俭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简素，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童误将馀衣……”一段，全袭《大唐传载》；又如《朱敬则传》中“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一段，全袭《隋唐嘉话》。这就说明，后人若要深入钻研唐代史事，也就一定要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上下功夫。

但是我国古代的文人常有一种偏见。他们重视正史，而对那些提供原始资料的笔记小说，则往往有意忽略，因此很多著作失传了。有些留存下来的文字，经过后人窜改，已与原书有所出入；有的经过书贾改编，更是弄得面目全非。有的本子经过多次传抄，也就产生了不少讹误。后人若要利用这些史料，又得下一番整理的功夫。

由于前人重视正史，所以历代都有研究新、旧《唐书》的著作问世。到了清代，更是出现了不少名著，如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合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岑建功撰《旧唐书逸文》十二卷，沈炳震有《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丁子复有《新旧唐书合钞补

正》六卷,王先谦有《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二百六十卷,赵绍祖有《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而像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八卷之类的专题著作,更是指不胜屈。反观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则寂寞无闻。这种情况自然与古时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有关。时至近代,由于西洋学术的输入,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已起根本变化,由轻视转向推崇,从而研究传奇的风气日趋兴盛,但对其产生的源头,那些短小精粹、融文史于一炉的唐人笔记小说,则仍不予重视。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偏颇的观点,不仅妨碍对其本身的探讨,同时也必然会妨碍正史与传奇的研究的深入。所以今天研究唐代文史的人,视野尚须开阔,研究领域尚须拓展。对唐代笔记小说进行认真的整理,深入的研究,以此为中介,可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中间出一条新路。这本小书便是我在这方面工作的初步结集,希望获得同行的指正。

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

“小说”一词，在我国古代文士的笔下往往略含贬义，有人以为某种记载不太可信，也就会以“小说家言”称之。但不管他人怎样对待这种体裁，古今文士还是喜欢写作“小说”，这只要检查历代书目，就可发现“小说类”的著作愈来愈多，而且“小说”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简直有兼收并蓄之势，把其他部类中的许多著作也陆续吸收或融合进去了。

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呢？

历代书目中子、史二部的 递为兴衰与相互渗透

中国学术最重源流之辨，而考古代学术分类的源头，则又必须上溯《汉书·艺文志》中所作的学派区分。班固沿用刘歆《七略》的成果，删取其要而成六“略”。《诸子略》中，分列儒、道、阴阳、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小说”一家就显得很特殊。因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有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各类著作。战国之时，百家蜂起，西汉之时承其馀绪，仍有各派人物在活动，因此刘歆、班固等人按照各派宗旨进行分类，也就指明了我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十家之中前面九“家”都有其明确的宗旨，可以列出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杂家”与

儒、墨、名、法等家有所区别，未能独标宗旨，但仍有其代表性的著作——《吕氏春秋》二十六篇。颜师古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书的历史地位，联系当时形势就可明白。战国之末，由秦统一天下之势已很明显，学术界也就出现了统一思想的要求。首先反映这一趋势的，就是秦国的权相吕不韦，他集合了各学派中人物编成《吕氏春秋》一书，所以《汉书·艺文志》“杂家”的小序中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师古曰：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见王治之无不贯，（师古曰：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此其所长也。”可见先秦各家都有用世之意，“杂家”则是为适应一统天下的政局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的学派。吸收各派之长，为建立新的政权服务，这也就是他们独树一帜的学术宗旨。^①

“小说家”的情况就不同了，《汉书·艺文志》小序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刘、班给“小说”下的定义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亦即并非出于上层人物之口，在当时来说，显然评价很低，这是后人常以贬义称呼“小说”的原因。刘、班在《诸子略》的序中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蠹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小说家言既不能用以经世，又不能形成一种具有明确宗旨的学派，这在重视政治实用价值的古时学者看来，地位当然不高了。刘、班一方面说“诸子十家”，一方面又说“可观者九家而已”，似乎

“小说”不成其为“家”，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显示出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或许刘、班嫌这种“街谈巷语、道听涂说”的“小说”内容太浅薄，可又难于归入其他类别中去，而小说家所表达的一些见解仍不失为某一方面的议论，因而不得不归入《诸子略》中去的吧。

但上述评语中仍有对“小说”加以肯定的地方。班固引用孔子之语证成自己的见解。按“小道可观”之词原出《论语·子张》，实为子夏之语，汉人行文习惯，可以归为其师先圣之语。班固引此，也只是借此提高自己立论的权威性就是了。因为儒家所理解的“小道”之中究竟包含不包含“小说”，无法加以证明，但这一评价却为“小说”在学术领域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后世文士纷纷写作“小说”，也可聊当“刍蕘狂夫之议”。

与班固同时的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一江淹《拟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评语约略相同。时至东汉，儒家之外的学派均遭排斥，难以经世了，小说更是说不上有什么治国之用，因此只能用于“治身理家”，但这样说却也承认了“小说”自有其价值。

《汉书·艺文志》中共著录了小说十五家。根据书名和班固自注，可以约略推知其内容。中如《伊尹说》二十七篇，《师旷》六篇，《天乙》三篇，《黄帝说》四十篇，班固以为皆出后人依托。《鬻子说》十九篇，《务成子》十一篇，妄称古人，均为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或称“考周事”，或称“古史官记事”，其内容当近于史部中的“杂史”一类，或许由于《汉书·艺文志》中只有《春秋》一类，而没有单列史部，而《春秋》又在《六艺略》中，所以刘、班才把上述诸书分到《诸子略》的“小说家”中去的吧。同类著作还有《臣寿周纪》七篇，顾名思义，当与上述诸书情况相同。

“小说家类”中还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注：“孙卿道宋子，其言

黄老意。”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不把此书列入道家中去呢?“道家类”中不是已经收入了许多黄老学派的著作么?看来此书内容也有“迂诞”的问题,和《黄帝说》类同,故而列入“小说家类”。同类之中还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也当属于“黄老”一派。此书之前为《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刘向《别录》称饶为“齐人”,大约也是一名燕齐方士。燕齐方士每以黄老学派的面目出现。《封禅方说》十八篇之出于方士,更不待言。

《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当以《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虞初”成了小说家的代称。班固说他为“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颜师古也说:“《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按《文选》载张衡此赋,李善引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说明虞初本身也是一名方士,与《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相合。小说之中包括着好些怪诞的方术。《汉书·艺文志》与《文选》注中还引应劭释《虞初周说》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则又可知这些文字与杂史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今《逸周书》中仍有很多怪诞的记载,如《王会》篇等即是。^②

由此可知,汉代学者对“小说”一词的理解,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其中包含着许多非现实生活中所有之事,按其内容而言,虽然不能列入可以经世的学派,但也应该算是学术中的一种支流别派。刘、班等人以此列入《诸子略》中,还是合适的。

这十五种书中的文字,今已遗佚殆尽,其中《百家》百三十九卷,唐时尚存,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虫篇》中说:“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可惜他没有明确说明引用过其中的哪些材料,以致后人无法窥测其内容。

鲁迅在研究了上述诸书的性质之后说:“右所录十五家,梁时

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可见小说自始起其内容就介于子、史之间。

以上是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所作的考察。大家知道，记录古代著作的书目，除《汉书·艺文志》外，要以《隋书·经籍志》为重要，因为前者著录了先秦至西汉末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后者续此而作，著录了东汉之后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二者互补，先唐时期学术界的情况可以约略觐知。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著作体例有巨大差别，因为前者是把古代学术分为六类而著录的，后者是按四部区分为四类，即经、史、子、集而著录的。这两种体例在我国学术史上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只是从魏代起，四部分类法逐步占了上风，并在皇家书库的编目中世代相沿成了定式。

这种情况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四部分类法的取代七略分类法，并不说明前者优而后者劣。二者的产生各有其具体的情况，只是随着学术界各类著作的发展，自然地形成了这一趋势。战国之时，百家争鸣，西汉时期，流风馥韵尚存，因此刘、班在《六艺略》后首列《诸子略》，按儒、道、阴阳、法……各家排列。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其他学派势难再有重大发展，因此诸子类的著作逐渐萎缩。钱大昕《答问》十曰：“隋唐以后叙书目者，大率循经、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释道、方技而一之。”（《潜研堂文集》卷十三）这种情况正好与史部书籍的蓬勃发展成一鲜明对比。

先秦至西汉时，史学未兴，《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仅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等数种才是真正的史书。因为数量太少了，班固只能将之附于《春秋》类中。但自东汉起，史部著作层出不穷，而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类型，后人再要把这不

同门类的大量著作归入《春秋》类,无疑是不合适的。史部的单独成类,乃事势之所必然。

后人也曾想在《七略》的基础上略作调整,解决上述难题,例如宋秘书丞王俭撰《七志》四十卷,一曰《经典志》,记六艺、小学、史记、杂传。“杂传”而称“经典”,首先就会给人以“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感觉,强行扭合,势难为人接受。梁处士阮孝绪撰《七录》十二卷,采纳王俭《七志》中改《六艺》为《经典》的意见,首列“《经典录》内篇一”,但他把史部从中移出,而独标为“《纪传录》内篇二”,可见他顺应时势,根据实际情况,采纳了四部分类法中的合理成分。在王、阮以前,晋光禄大夫秘书监荀勖撰《中经新簿》,采用四部分类之法,按经、子、史、集排列,东晋李充撰《元帝四部书目》,已将次序改为经、史、子、集,这一变动,也反映了史部的蓬勃发展和子部的不断衰落。

唐代史学对小说的影响

到了唐代,史部著作愈趋发达,这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自汉末至隋末,战乱相寻,前后长达四个世纪之久。这与两汉时期政权的延续前后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大体保持稳定的情况相比,反差太强烈了。后代政权为什么越来越不稳,值得深入思考。而且朝代更迭频繁,夤缘际会的权谋之士处处逢源,而恪守儒家准则的忠贞之士则每横遭厄运,这样也就颠倒了原先的价值标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以致人心浮动,政权不稳。儒家重史学,立意重在正人心,垂鉴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渊父子建立新的政权之后,自然想到应该发扬古来的史官传统,藉修史以巩固政权了。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曰:

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杂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然而简牒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餘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③

李渊调集了当时地位最为尊显的官员如萧瑀等人，以及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文士如令狐德棻、颜师古等人，负责编纂前代历史。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直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上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合称《五代纪传》，诏藏于秘阁。这是皇家主持修史的成功尝试。新政权建立之后，命宰相领衔，征集其时著名文士，纂修前代历史，这在后来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就成了常规。

贞观十七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魏徵主持编纂《经籍志》。书的分类，参考过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后因《五代纪传》分别行世，《经籍志》附于《隋书》，故名《隋书·经籍志》。由于这一原因，《志》中反映了唐初中秘书和梁代存书的情况。

唐太宗的重视修史，其热忱远超乃父。他想得更为深远一些。隋文帝统一天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但仅历两代，即告覆灭。李氏政权是在隋末动乱后的废墟上建立的。李世民自十八岁起就参与征战，历尽艰辛，才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他目睹农民起义的强大威力，深谙古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古训的深刻涵义，因此自他接任皇位始，就常与臣下研讨历代成败兴衰之理，尤其是